

历史主体分类:马克思“法国史三书”的理论贡献

杜黎明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摘要:“法国史三书”透过近代法国革命舞台的众生相,在揭示历史过程、历史结局的必然性的过程中,生动阐释了历史主体理论。唯物史观视“现实的人”为历史主体。剖析历史主体的类型、结构及关联,旨在阐释论证“现实的人”何以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书写出不同的历史。“现实的人”的生命周期见证其从以生物属性为主向以社会属性为主的发展,刻画其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的转变;“现实的人”参与历史活动、融入历史进程存在自发和自觉之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主体,存在自在与自为、自发与自觉的类型区分。历史主体在历史活动、历史进程中存在“引领”和“追随”的角色差异。中国共产党探究和运用现代化一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特殊规律的伟大成就,确证了党的历史主体自觉性。国家五年规划承载和落实中国式现代化使命的历史成就,确证了党的历史主体引领性;不懈求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成就,则进一步确证了党的历史主体自觉性与引领性耦合而成的自觉引领性。

关键词:“法国史三书”;历史主体;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6)03-0005-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60301

“法国史三书”,即《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客观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中后期法国革命的历史。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刻画法国革命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历史剧中人”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共同创造法国革命史的过程和结果,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揭示蕴含在法国革命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规律。“法国史三书”是运用唯物史观,以19世纪中后期法国前后20多年的历史为研究对象,阐发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光辉著作。学者们多针对“法国史三书”中的单一文本展开研究。在对《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研究中,刘建江^[1]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叙事、人的解放的国家叙事、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叙事三个维度,揭示马克思对“空论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闵超认为,鉴于无产阶级作为理论层面的革命主体并不具有现实主体地位,马克思从革命目标的指导性、革命策略的行动性选择以及革命条件的战略性三个维度,为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意识觉醒提供理论准备^[2]。在对《雾月十八日》的文本研究中,解丽霞认为,马克思将空间引入历史研究,基于空间“物质—精神”双重向度的开掘,建构起融合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社会空间理论^[3]。付天睿认

收稿日期:2026-03-12

作者简介:杜黎明,男,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自觉引领的历史主体特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学理探究”(24FKSA002)。

为,微观的短时段事件情境、中观的共时性社会结构及矛盾、宏观的历史性趋势的统一是一种递进式的综合,这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政治情境化的维度上的补充发展^[4]。在对《法兰西内战》的研究中,黎家娴认为,马克思从主体构成、表现方式、具体实践、领导力量、制度效能、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真正民主制度”进行了初步的建构^[5]。姜正君认为,人民主权的实现前提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内在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保障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6]。上述单一文本研究奠定了对三个文本进行综合交叉研究的基础,通过对法国革命的整体把握以深化和丰富唯物史观,也就成为“法国史三书”整体研究的理论使命。崔增辉基于对《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的整体考察,研究了马克思对历史主体概念的实践证成^[7]。宋朝龙通过对“法国史三书”的整体考察,探究了无产阶级政党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逻辑^[8]。尽管“法国史三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具体从历史主体特别是从历史主体分类的角度切入的研究还不多见。唯物史观将历史主体从神、从绝对精神还原为人,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体研究历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孙正聿认为,马克思以阐释论证人与自然相互生成中形成人类历史的方式,确证“现实的人”的历史主体地位^[9]。王福民考察了马克思历史主体观体现在历史主体的内在特质及其结构、历史主体的创造性及其限度三个逻辑向度上的辩证旨趣^[10]。沈江平考察了历史规律、历史主体与历史主动的内在关联,指出历史主体具有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会对历史规律运行施加影响,历史主体遵循历史规律的创造活动就是历史主动^[11]。王代月从国家观的角度探究马克思的历史主体思想,认为马克思以揭示国家取得独立性假象的物质根源的方式,阐释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12]。田海舰以考察马克思“人民”范畴的历史出场的方式,从学理上阐释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13]。学者们从唯物史观理论根基与实践展开的维度,全面揭示历史主体的存在论内涵、辩证逻辑及当代价值,进而将历史主体研究贯通于历史规律、历史主动及人民主体的当代实践议题之中。

历史是人的历史。“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519},要阐明人在历史进程中自主生成的内在机理,说明具体的人类历史进程,就“必须把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形而上研究”^{[9]448},与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形而下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对人的存在的全面、总体的把握。对“现实的人”的总体考察,以及对历史主体的概念把握在阐释历史规律、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揭示历史进程走向、历史结局的成因上还有较大的理论空间。“现实的人”之间存在差异,历史主体并非均质的统一体,这就提出了历史主体分类的理论要求。“法国史三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阐发,是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历史剧中人”——个别具体的“现实的人”,诸如路易·波拿巴、梯也尔,以及具体人所形成的组织和集团,诸如秩序党、正统派,还有资产阶级中的特定集团,诸如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的行为剖析而得以实现的。历史主体是对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历史剧中人”,即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施加直接影响的“历史活动主体”的理论抽象。“法国史三书”以透视不同的“现实的人”的行为选择的经济动因的方式,深刻回答了法国革命何以发生,其过程和结果何以如此等历史之谜。因此,“法国史三书”也是马克思阐发历史主体分类理论的光辉著作。

一、唯物史观视“现实的人”为历史主体

“现实的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有机统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4]209},“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个体,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分子;同时更是社会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是有社会历史生命的个体。“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4]188}正是人的社会属性,使人克服生物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实现永生,具有永续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分别从抽象和具体两个维度,考察和发掘“现实的

人”的理论使命。“现实的人”既是对历史长河中所有从事生产生活的人的抽象和概括,也是对具有独立人格、具有特殊个性的历史当事人的具体确认^[15]。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14]11},指出其关注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具体的人。事实上,“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 citoyen[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14]46}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和“思维抽象”,是哲学的宏观表达,旨在把历史主体还原为人,完成对神创史观的清算。《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分别从“经济一人”“阶级一人”的维度,对“现实的人”进行思维具体层次的考察^[16]。《资本论》对“现实的人”做出了资本家和工人的总体区分,对现实的“资本关系”与“生产力”的动态发展和静态结构进行了微观透视,对“现实的人”作为结构性的存在进行了抽象和具体两个维度的考察。唯物史观视“现实的人”为历史主体,这赋予“历史主体”概念以阐释和揭示个体生命有限且个体间存在显著差异的“现实的人”何以获得永续价值的理论使命。

(一)“现实的人”以“个体人”和“群体人”的形式存在

历史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通过生儿育女而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14]195-196} 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历史主体”并不是要记录和概括人不断重复出现的现象,而是要从“现实的人”的历史主体属性、历史主体之间的关联角度,剖析历史结局的成因,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历史主体并非对所有“现实的人”的统称,而是对历史结局有直接影响的“个体人”和“群体人”的理论抽象。

现实的“个体人”是历史的最小构成单元。“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295},历史就是全部“个体人”的汇聚。现实的“个体人”之间存在差异,少数活跃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个体人”,因其对历史活动、历史进程有重大而直接的影响,被人们称为历史人物,单独以历史主体的方式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规律的样本,“法国史三书”中,马克思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重点解剖了路易·波拿巴,探究“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17]4},进而发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一历史规律^{[17]9}。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研究的对象路易·波拿巴,都是以“个体人”形式存在的历史主体;只不过前者因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而成为伟大的“千年思想家”,后者因开历史倒车而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小丑。

“个体人”汇聚形成群体性历史主体。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501}“现实的人”总会与其他人交往,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现实的个体人之所以能独自成为历史的最小构成单元,这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孤立化的”^{[18]147}。人类最初是以群体而不是个体的形式存在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18]6} 人的社会属性在现实层面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人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群体人,为此个体人愿意以个体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的牺牲为代价换取群体的存在和发展。群体人直观表现为个体人依据特定的联系纽带结成的集合,联系纽带不仅成为区分群体人的依据和标志,更是决定群体性历史主体的历史创造力的内在因素。历史长河中的绝大多数沉默者,虽然不能以“个体人”形式独立成为历史主体,却以“群体人”一分子的形式成为历史主体。在民族国家发展史上,以群体人形式存在的社会组织、政党、阶级、利益集团等,就是典型的群体性历史主体;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主权国

家、国际组织构成最为重要的历史主体。

(二)“现实的人”的思想意识是区分历史主体的重要依据

思想意识反映和揭示历史主体的行为动机。“法国史三书”把思想意识作为区分历史主体的依据,对此,马克思在剖析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表现时指出:“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跳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17]41} 思想意识反映和体现历史主体对其在历史活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角色与功能的认识,是历史主体性的重要内容和表现。“现实的人”的生命周期见证其从以生物属性为主向以社会属性为主的发展,刻画其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的转变;“现实的人”参与历史活动、融入历史进程存在自发和自觉之分。基于上述双重维度,“现实的人”作为历史主体,形成了自在与自为、自发与自觉的类型区分。

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变揭示历史主体意识的生成。自在和自为是认识论中的两个范畴,“在黑格尔那里,自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或某种概念中的尚未展开的对立所具有的原始同一性,而在自为中,这些隐藏的要素的区别和分离显现出来了,它们的抗争开始了。”^{[19]63} 马克思曾在“自在和自为的实在的个体性”^{[14]202} 中,将自在、自为用作表述人的存在状态。此外,马克思还在“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14]41} 的论述中,将自在状态界定为独自存在而不和其他人发生联系的状态;恩格斯也曾做出“革命前,工业阶级处于自在的状态”^[20] 的表述,把自在状态视为一种不受外在干扰的状态。处于自在状态的“现实的人”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或是尚不具备意识和思维的能力,或是失去了自我意识。在阐释逻辑修养和辩证修养时,马克思关于“不过自然科学家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自在之物这个词,只有在跨入哲学时才敢于应用它”^{[19]494} 的论述,给予历史主体研究的启示在于,自在历史主体仅仅是研究的参照基点,只是逻辑思维的材料,并无现实意义。

自为历史主体有明确的主体意识。马克思以自为范畴强调人对自身的认知,“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人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己。”^{[14]211} 基于这一界定,“现实的人”对其在历史活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功能、地位和作用的认知即形成历史主体意识。据此,“现实的人”处于自在状态,即为自在历史主体;处于自为状态,即为自为历史主体。自在历史主体没有明确的主体意识,依据动物本能感知社会现实,参与历史活动,融入历史进程;自为历史主体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有明确的认知,并通过参与社会活动、融入历史进程确证这种认知。

自发历史主体具有主体意识的或然性。自发活动的发生机制呈现双重面向:既可能是主体意识缺场,基于生物本能而自然发生,正如“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14]534}。也可能是建立在主体意识之上,以明确的认知和意识为前提,正如“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21]。“现实的人”自发地参与历史活动、融入历史进程,便成为自发的历史主体。自发历史主体既可能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基于对社会历史的理性认知而参与历史活动、融入历史进程,也可能没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基于对社会历史的动物本能性反应而参与活动、融入历史进程。

历史主体自觉性是对主体意识的确证和体现。自觉行动建立在对行动的目的和动因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决批判唯心主义,一方面自觉地同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14]3} 正是基于这种自觉性,他们既对旧唯物主义缺陷有深刻认识,又对新世界观的使

命有深刻把握。“现实的人”的主体意识自然体现在其参与的历史活动中,而“现实的人”的历史主体自觉性既体现在其对自己思想的言说上,更借助自觉历史活动加以确证。具有明确主体意识的自为历史主体,只有自觉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才能上升为自觉历史主体。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14]77}倘若没有对科学支配自然力的规律的认知和运用,“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就不可能被自觉地运用。明确的历史主体意识,加之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是自觉历史活动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历史主体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越深刻,历史主体自觉性对主体意识的确证也就越充分。

二、历史主体自觉性引领性叠加耦合为自觉引领性

“现实的人”在历史活动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历史进程和历史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对历史结局施加不同的影响。“现实的人”作为历史主体,在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上存在分异,主动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的自为历史主体即自觉历史主体;在历史主体类属研究的特殊语境中,自为与自觉是区分历史主体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的状态的理论范畴。“现实的人”中,既有历史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又有历史活动的随大流者、追随者。引领与追随是区分历史主体在历史活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功能的理论范畴。历史主体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以引领历史发展,并在引领历史发展中进一步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由此历史主体的自觉性和引领性便叠加耦合为自觉引领性。

(一) 自为与自觉揭示历史主体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的分异

历史规律揭示和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内在的必然性。马克思从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揭示了群体性自为历史主体的认识客体属性,指出探究历史规律的途径和方式。“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14]188}探究历史规律,就是透过自为历史主体的行为选择,揭示历史活动、历史事件内在的必然性。“现实的人”总会存在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的意愿和能力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历史活动及其结果的重要成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22]13}这一论述向中华儿女发出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号召。

自为历史主体仅被动接受历史规律的安排。对“历史剧中人”而言,历史规律是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一旦局限和停留在偶然的历史表象,且缺乏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的意愿和能力,就只能被动地、不得已地接受违背自己意愿的历史结局,正如法兰西革命中“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它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23]22}。法兰西的革命舞台,上演的是历史主体因缺乏对历史规律的认知而自食其果的悲剧。1848年法国“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二月革命”^{[23]34},推翻代表金融贵族利益的“七月王朝”后,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尽管工人有自己明确的诉求,且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囿于对历史规律认知的缺陷,终究并未能享受革命的成果,也未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临时政府施行四十五生丁税,“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23]41},因而在农民看来,“巴黎无产阶级就是靠他们出钱来享乐的浪费者”^{[23]41}。作为二月革命功臣的工人,却由此丑化了自己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临时政府为缓解财政拮据而采取措施,同样因历史规律认知的缺陷,不仅未能对金融贵族造成实质性的打击,反而加深了自己对金融贵族的依赖,事实上强化了金融贵族的统

治。巴黎公社总体而言是自为而不是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公社委员中的多数派即布朗基派,其绝大多数成员“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24]12},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24]12}。因而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诸多当时理应完成的任务,最终导致失败。

自觉历史主体透过历史表象发现历史规律。历史规律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倘若历史主体缺乏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依据自身对历史表象的感性认识参与历史进程,不仅难以实现其目的,反而会事与愿违。无产阶级是法兰西革命的主力军,最初用劳动权概括自己的革命要求,他们依据对社会现实的感性认知,把劳动权视为通过劳动养活自己的权利,却没能透过历史的表象认识到“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利,支配资本的权利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联”^{[23]61}。凭借对社会现实的直观感性认知,无产阶级积极参加革命,结果不仅革命果实旁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而且使无产阶级陷入更加窘迫的困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23]50}。马克思对法兰西革命的洞察,不仅在于发现“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的基本规律^{[23]127},而且在于透过“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23]127}的表象,揭示隐藏在表象中的“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23]127}的本质;不仅在于基于对革命规律的认识做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23]127}的历史预测,而且在于做出“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23]127}的历史判断。

自觉历史主体主动探究并运用历史规律。“现实的人”要跳出“憎恶现状而又不断地巩固现状”^{[23]132}的怪圈,必须在深刻把握社会现实、领悟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有所作为。历史剧中人看似偶然的行为选择和看似随机的历史结局中隐含着历史的必然性。自觉历史主体探究历史规律的使命和任务就是揭示这种必然性。路易·波拿巴创立的“以政变为出生证,以普选为批准手续、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23]58},依靠农民阶级、拯救工人阶级、拯救有产阶级、恢复国家荣誉的声称虽然充满欺骗,但也揭示出“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的历史必然性^{[23]59}。历史挫败迫使历史活动主体总结失败教训,进而发现历史规律,修正自己的行动。自觉历史主体既从自身和他者的实践挫败中发现历史规律,也注重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运用思维的力量,在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把握中发现历史规律。正是凭借对历史规律的不懈探究和运用,自觉历史主体才成为历史剧的主角,为后人照亮前行的道路。持续探究历史规律成就了马克思惊人的历史洞察力,正如恩格斯对他的评价,“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24]3}。马克思正是在发现无产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3]111}之后,才正确指出工人阶级“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24]64}。习得历史主体自觉性并非一蹴而就,也非一成不变,只有不懈自觉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的历史主体,方能在历史舞台上长期发展;而违逆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主体,则终归会在历史进程中走向消亡。

(二) 引领与追随揭示历史主体在历史活动中的角色功能分异

引领—追随,体现人的社会属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秩序。马克思特别关注了巴黎公社的革命运动中的“引领—追随”关联。认为“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24]101}。跟着统治阶级走,无

论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还是出于沿袭旧制的路径依赖,其根源均在于对历史规律、历史大势把握的不足;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无论是自发的追随还是自觉的追随,其根源均在于他们从工人阶级的活动中看到历史发展的希望。

历史主体对历史活动的引领存在自觉与否的区分。历史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波动与曲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历史主体因时势所需、机缘巧合而成为历史活动的引领者;其发起组织领导历史活动并不是建立在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法国革命中的领导者变迁,“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17]33}。这并非简单地上演成王败寇的历史剧,而是历史活动引领者缺乏对历史规律的探究和运用而导致的悲剧。马克思还以历史活动引领者的自觉性为依据进行革命史分期,“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23]19}。这一论断也是对作为历史主体的“自觉的少数人”和作为历史主体的“不自觉的群众”关联方式的论断,揭示了历史进程中“引领型历史主体”和“追随型历史主体”的分异。

唯有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的自觉历史主体才能引领历史发展。历史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引领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存在引领历史活动和引领历史发展的区别。历史活动既有顺应也有违逆历史趋势和历史潮流的情形,引领历史活动是就具体的事件、具体的历史活动而言,引领历史发展是就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而言的,亦即引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历史活动引领者只有深刻领悟历史规律,准确把握历史大势,科学预判未来,才能实现从引领历史活动向引领历史发展的飞跃。马克思对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24]24}的后果的预测,以及对“迫使法国投入俄国怀抱”^{[24]29}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的预判,无不深刻昭示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对准确预测未来、掌握历史主动的重大意义。

(三) 历史主体自觉性和引领性叠加耦合为自觉引领性

历史主体属性的叠加反映和揭示人的复杂社会性。自为与自觉、引领与追随,分别从探究和运用历史规律、在历史活动中的角色与功能两个维度,揭示具有主体意识的“现实的人”之间的差异。历史主体的“自为一自觉”属性与“引领—追随”属性叠加,衍生出自觉引领、自觉追随、自为引领、自为追随四种复合型历史主体。历史主体属性叠加,旨在对存在复合型历史主体的事实进行理论阐释,而非对历史主体复杂属性及其成因的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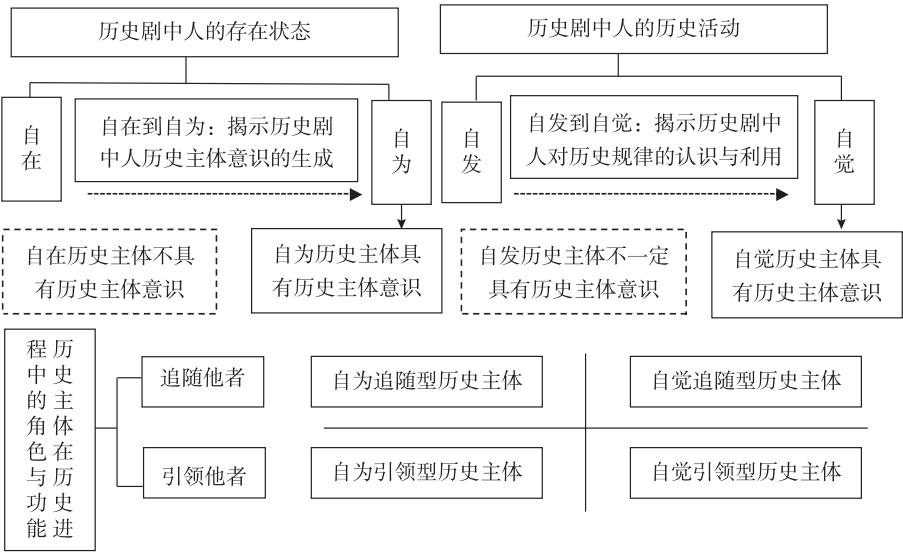


图1 历史主体分类的思路与框架

自觉引领型历史主体是掌握历史主动的核心和关键。掌握历史主动,是历史主体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勾画历史发展蓝图,并团结带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群众,把历史发展蓝图变为现实^[25]。勾画历史发展蓝图,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必须不懈探究、不断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凝聚创造历史的动力与活力,必须代表最广大普通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激发和释放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历史进程中分化出自觉引领型历史主体,历史发展才可能表现出“人为设计”的色彩,历史才是“创造”的结果,而非琐碎杂乱的历史事实的堆积。自觉引领型历史主体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勾画历史蓝图,指引历史创造的方向和目标;在组织领导历史活动的过程中,将自己探究历史规律的认识成果转化扩展为历史活动参与者的思想意识,拓展自觉历史主体的规模,进而凝聚起创造历史的磅礴力量。自觉引领的历史主体属性,是历史主体自我修为、自觉淬炼的结果。在百余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依据时代主题、历史使命的变迁淬炼自觉引领性,始终坚持主动探究、正确运用历史规律,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境界。具有自觉引领的历史主体特质,正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直接回答。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自觉引领型历史主体的确证

历史主体自觉引领性是历史主体自觉性和引领性的耦合。自觉引领型历史主体既针对引领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持续深入探究历史规律,又充分利用引领历史发展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条件,不断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6]¹⁸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程和显著成就,确证了中国共产党自觉引领的历史主体特质。确证的重点和落脚点在“证”,其基本意涵是求证、检验和证明;确证的目的在于确证者以外的他者相信特定事实,认同特定理论观点和主张。

(一) 中国式现代化确证党的历史主体自觉性

确证历史主体自觉性,是透过历史主体的具体的行动及实实在在的历史创造成果,揭示其对历史规律的探究和运用。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具备由文化根基层、目标引领层、核心要素层、评估优化层、系统机制层所构成的立体结构,呈现出开放性、整体性、结构性、稳定性、层次性的鲜明特征”^[27]。若不能深刻把握现代化的规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实践的成功;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对现代化一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特殊规律的深刻把握。

探究和运用现代化一般规律确证历史主体自觉性。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社会面貌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曾改变;缓慢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孕育现代化这一理论范畴^[28]。工业革命拉开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序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9]³⁶。将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引发的系统性社会变革,有着坚实的史实基础。生产力快速发展孕育催生了现代化这一理论范畴,因此,生产力快速发展规律是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生产力既有质的规定也有量的特征,新质生产力是以高新技术,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为支撑的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从系统的整体视角,对科技与生产力关系把握的质性跃升,明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30]。中国共产党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升为国家战略,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成就,是对党探究和运用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历史主体自觉性的确证。

探究和运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规律确证历史主体自觉性。持续书写的“两大奇迹”新篇章,与西方频现的社会撕裂、否决政治形成鲜明对比。以生动直观的事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西方不可企及的国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的伟大成就,国家治理效能提升规律由此也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规

律。国家治理效能由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耦合而成,国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理论范畴是人的思维对社会生活的抽象、对社会存在的反映。”^[28]理论范畴的逻辑演绎也就成为人们预见未来的重要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把国家治理纳入现代化的内容体系,拓展和深化了现代化的内涵,体现和凝结了我们党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成就。“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强大反差、强烈对比,正是从探究和运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规律的角度,对党的历史主体自觉性的确证。

(二) 中国式现代化确证党的历史主体引领性

中国共产党以规划特别是五年规划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31]327}。五年规划并非中国首创,亦非中国独有,但唯有中国坚持接续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既“一张蓝图绘到底”,又“全国一盘棋”,前者在时间维度确证党的历史主体引领性,后者在空间维度确证党的历史主体引领性。

“一张蓝图绘到底”确证历史主体引领性。我国已经接续编制和实施了15个五年规划(计划)。从最初的“国民经济计划”,到“六五”开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再到“十一五”开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尽管党领导规划制定实施的思路在更新,规划引领发展的领域在拓展,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在改进,但规划的主题、规划指向的未来目标始终如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2]366}党中央得以用五年规划建议明确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规划编制中,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充分吸收民智民意,使五年规划充分反映专家意见、群众智慧、社会期盼,凝聚全社会共识,激发全体人民奋斗力量。在实施过程中,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保证规划高效实施^[32]。制定实施五年规划,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方式,有效确证了党的历史主体引领性。

“全国一盘棋”确证历史主体引领性。坚持“全国一盘棋”彰显党对各区域、领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的重视;既将满足“全局之所需”作为规划目标和任务分解的依据,把国家发展总目标分解为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子目标,落实到区域规划、专项规划中,以确保国家发展总目标的实现;又通过施展“一己之所长”、尽“一域之所能”,兼顾各部门、各地区、各领域的发展诉求,深化分工合作,使其找准各自的定位,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没有党的全面领导,就不可能“全国一盘棋”。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化区域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对口帮扶、对口支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彰显“全国一盘棋”的重大实践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生动直观地确证了党的历史主体引领性。

(三) 中国式现代化确证历史主体自觉性和引领性的耦合

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党发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6]52}的警醒。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党独有难题提出“六个如何始终”的追问,党中央着眼于“推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33]5},作出了不懈求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战略部署。不懈求解大党独有难题,其实是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效能,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依据;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就是对历史主体自觉性与引领性耦合的确证。

不懈求解大党独有难题才能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的可操作性、制度的执行力,是决定国家治理水平、治理效能的制度性因素。制度只有深刻反映了其所规范和约束的发展领域的规律,才可能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制度只有有效契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才可能有较强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与强大的制度执行能力耦合为稳步提升的国家治理效能,不断开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不懈求解大党独有难题,把初心和使命融入制度中,在不断完善制度体系的同时,使制度保持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保持党内思想、意

志和行动的统—,使制度的制定主体、实施主体、受制度规范和约束的对象在目标意愿、利益追求等方面实现有机协同,进而以高效能的国家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成就确证了自觉性与引领性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对执政党领导力、对历史发展引领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执政党把握现代化各领域发展规律的检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使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我们党着力推进国家治理由“经验治理”向“科学治理”转变,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这些历史性成就,就是对历史主体自觉性与引领性耦合的确证。

党在百余年奋斗中不懈淬炼历史主体自觉引领性,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了党自觉引领的历史主体特质。“自觉引领型历史主体”这一理论范畴的逻辑演绎,为中国奇迹的理论叙事提供了新方法。

[参 考 文 献]

- [1] 刘建江.《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历史叙事的三个基本维度[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10):33-42.
- [2] 闵超.《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意识觉醒的理论意义及其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3):154-159.
- [3] 解丽霞,王丹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空间革命”的三重建构[J].哲学分析,2025(1):78-90,197.
- [4] 付天睿.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政治情境化发展——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中心[J].教学与研究,2022(8):76-85.
- [5] 黎家娴.《法兰西内战》对“真正民主制度”的探索及其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9(6):122-127.
- [6] 姜正君.马克思的人民主权思想及其当代启示——重读《法兰西内战》[J].观察与思考,2022(4):21-29.
- [7] 崔增辉.马克思对历史主体概念的实践证成——基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考察[J].社会主义研究,2024(2):32-38.
- [8] 宋朝龙,赖信添.无产阶级政党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逻辑——马克思“法国史三书”的政治学价值再探析[J].科学社会主义,2022(2):40-48.
- [9] 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10] 王福民.马克思历史主体观的辩证旨趣[J].哲学研究,2013(8):15-20.
- [11] 沈江平.历史规律、历史主体与历史主动[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11):64-73.
- [12] 王代月.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变革及其理论效应[J].哲学研究,2023(2):38-48,128.
- [13] 田海舰,连童.马克思“人民”范畴的历史出场、基本含义及当代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26-133.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杜黎明,马敏.自觉引领型历史主体: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类型学研究的新范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23-32+195.
- [16] 莫小丽.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嬗变——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J].现代哲学,2023(5):45-53.
- [17]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3.
-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3.
- [22]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3] 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4]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5] 杜黎明. 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主动的关键与启示[J]. 人民论坛,2022(18):53-55.
- [2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7] 孟东方,陈沉.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运行研究论纲[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5-16.
- [28] 杜黎明. 扬弃与开创: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大贡献[J]. 兰州学刊,2020(10):14-23.
-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0] 田方林,魏榛.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丰富与发展[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15.
- [3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2] 王一鸣. 深刻认识五年规划彰显的制度优势[N]. 人民日报,2025-10-21(9).
- [33]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

Historical Subject Classificatio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Marx's "The Three Books on French History"

Du Liming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diverse figures on the stage of modern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y, "The Three Books on French History" vividly expounds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subjects by reveal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From a materialis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eal people" are regarded as the agents of history. Analyzing the types, structures, and interrelations of historical subjects aims to explain how "real people" generate different histories under varying spatiotemporal conditions. The life cycle of "real people" witnesses their development from primarily biological attributes to predominantly social ones, illustrating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being-in-itself to being-for-itself. In participating in historical activities and integrating into historical processes, "real people" exhibit distinctions between spontaneity and consciousness. As historical subjects, "real people" can be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eir degrees of being-in-itself versus being-for-itself, and spontaneous versus conscious engagement. Within historical activities and processes, historical subjects assume differing roles—leadership or following.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exploring and applying both general laws of modernization and specific law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nfirm the Party's self-consciousness as a historical subject. The historical accomplishments embodie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 national five-year plans validate the Party's leading role as a historical subject. Furthermore,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in continuously addressing unique challenges faced by a large political party further confirm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s self-consciousness and leadership into a distinctive form of conscious leadership.

Keywords: "The Three Books on French History"; historical subjec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左福生]